

流江文建資料

第五輯



沅江文史资料

第五辑目录

- 浅忆陶铸同志视察白沙洲 肖汉民 (1)
回忆与邵力子先生的一次通讯 曹建璋 (7)
高宗彝反清起义始末 孙青斋 (10)
“马日事变”后沅江的换户团与清乡委员会 荷涤湘 (13)
参加常德会战浅忆 叶长青 (16)
沅江蠡云乡、汉寿蠡山乡自卫队联合抗日的经历
刘仲云 (21)
日冠刷皮杀人暴行四例 王世功 (27)
可怜草尾河边骨 刘绍昆 (30)
民国时期沅江县的田赋 高成周 (33)
建国前草尾镇工商概况 谢典荫 (39)
民国时期捐资办学情况简介 汤澄亚 (44)
民国时期沅江县城私立学校梗概 秋水 (46)
就读琼湖书院浅忆 吴卫中 (51)
建国前沅江的戏剧活动简况 周尚文 金责堂 (55)
草尾步云球队 廖晓庭 黎明 (61)
抗日时期草尾一次闭市始末 荷涤湘 周尚文 (64)
王伟能镇压伤兵事件之我见 刘剑秋 (66)
建国前沅江县军事科科员韩士贻伏法记 谷和邦 (69)
张树序救夫事略 陈少邦 (81)

志城垸的一场东佃官司	文佩璋	(85)
张正奎将军事略	孙青斋	(89)
先祖父闻铭公引述	张资荪	(91)
郭方瑞简介	皮子健	(93)
高王峰其人其事	陈之	(95)
九如堂药号简介	李锡卿	(101)
草尾地区积谷仓简介	王聘之	(104)
介福横河义渡始末	刘绍昆 刘鸣谦	(106)

浅忆陶铸同志视察白沙洲

肖 汉 民

白沙洲位于县邑北部共华垸之西南，原属白沙公社所辖。一九六三年初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曾视察过该地。我当时是该公社党委书记，曾亲历其境，聆听了教诲，现仍记忆犹新，兹将其况，浅忆如下。

一九六三年春节过后不久，绵绵春雨不断。一天下午公社办公室喊我接电话，我接过电话筒，县委一位领导同志说：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明天要来白沙公社检查，重点要看看新民大队五生产队，请你作好接待准备……”。

新民大队五生产队，地处白沙公社东南，面靠江堤，地势较高，土质肥沃，全队共有18户，57人，有水田160余亩，旱土10余亩。一九六二年在队长曹绍华带领下，社员同心合力，一举获得较大丰收，全年共收粮食达128000多斤，亩产800多斤，跨过了《农业纲要》。这年该队向国家交售粮食58000多斤，人平1000多斤，除留去种子、储备粮10000余斤外，社员分配58000多斤，也是人平1000多斤，因此，人称“双千斤队”。

接过县委电话后，我立即与在社的干部开了个会，传达了县委意见，就如何作好接待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工。会后我去新民大队找大队党支部书记曹国勋和队长曹绍华商议，就检查现场、座谈地点及参加座谈人员等问题一一作了安排。傍晚我回到公社机关，检查了接待工作落实情况后，便回到卧室，查阅公社有关资料，开始起草汇报提纲。半夜

朔风渐大，只见窗外树枝左右摇摆，呼呼作响，鹅毛似的雪花，铺天盖地而来，气温降到摄氏零度以下。这时，我身体有些不支，便停笔上床休息。

第二天清晨，我提前起床，只见大地一片洁白，风力虽有减小，但雪花仍在空中飞舞。这时，我心想天气这么恶劣，洞庭湖风浪又大，陶铸同志一定不会来了。

出人意料，早饭后，县委办公室又打来了电话说：“陶铸同志已经乘汽轮出发了……”。接完电话，我立刻身着雨衣与大队、生产队的几个同志一同到白沙洲横河码头迎接。一路上，我心潮起伏，心想陶铸同志年过半百，顶风踏浪，置冰雪严寒而不顾，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卓绝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啊！

上午十点左右，远远望见一艘汽轮从挖口子方向驶来，由远而近，我们认定是陶铸同志乘坐的汽轮了。顿时，白沙洲横河码头活跃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高叫：来了！来了！

汽轮驶到白沙洲横河码头后，车了一个窝子，慢慢靠拢沙洲坡岸，抛下铁锚，搭好跳板，请陶铸同志上岸。这时，陶铸同志和同来的金明（中央财政部长）、张平化（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孙云英（中共益阳地委书记）等领导同志走出船舱，一个挨着一个次第走上岸来。上岸后，陶铸同志笑容满面，同我们一一握手，便漫步走出河洲，登上江堤。因久雨不霁，泥深路滑，行走艰难。但陶铸同志精神抖擞，大步向前，边走边提问，首先问江堤有多高程，能抗拒多大洪水位。我答：“有吴淞高程三十六米多，可超出一九五四年最高洪峰七、八公寸”。陶铸同志指示说：“还应加高加厚一点”。当他看到田野上一片绿肥时，便问道：“你们公社种了多少绿肥”？我答：“全社种了 12000亩左右，约占水

田面积40%”。陶铸同志说：“还应多种一些，绿肥是有机质肥料，它可培养地力，是增产增收的好措施”。当他看到社员住的尽是茅房时，便问：“湖区能不能盖砖瓦房”。我们说：“可以，但目前经济困难，社员收入低，盖不起来”。陶铸同志说：“你们应积极开展多种经营，鼓励社员多养猪、养鸡、养鸭，千方百计增加社员收入，逐步改善社员住房条件”。

从白沙洲横河码头到新民大队五生产队约有两、三华里路，陶铸等领导同志，一路谈谈笑笑，问问答答，不知不觉便达到了。曹绍华队长领着陶铸等领导同志走下江堤，进入社员赵寿云家休息。饮茶后，接着就同社员们座谈。参加座谈的社员有赵寿云、赵连堂、赵兰贞（女）、祝长青、肖作和、何砚根、陈运生、龚德正、谢光华和大队党支部书记曹国勋、生产队长曹绍华等人。

座谈会开始，陶铸同志将同来的中央、省、地领导同志逐个向参加座谈的社员作了介绍。当介绍到金明同志时，他风趣地说：“他是金明同志，中央财政部长，同孔祥熙一样，是‘垄断’全国财政经济的”。金明同志接着也风趣的指着陶铸同志回敬一句说：“他是陶铸同志，像清代陶澍一样的官，代表中央管五个省”。话刚落音，哄堂大笑。介绍完毕后，座谈正式开始，会计何砚根年纪最小，从未见过大官，心里非常害怕，在大门边坐立不安。陶铸同志发现后请他拢来就坐，他忸怩不就。陶铸同志进而向他招手说：“来！快来请坐，怕什么，我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拿起枪杆子造蒋介石的反了哩！”经他一说，小何才敢上前坐下。陶铸同志见小何坐定，笑着问他说：“你有对象没有？”小何答道：“没有”。陶铸同志说：“好！要提倡晚婚。办婚事要厉行

节约，不搞铺张浪费，要新事新办，移风易俗”。说得全场都笑了起来。

座谈会首先由队长曹绍华汇报了生产队的生产、生活和社员思想情况。接着陶铸同志就提了一系列问题，交社员们讨论，诸如：对《农业六十条》有什么意见？社员自留地留多少为宜？口粮分到户管理好不好？农田水利解决得怎么样？多种经营、家庭副业开展得如何等等。社员们见陶铸同志和蔼可亲，顾虑全消，发言热烈，有的发问，有的谈主张，有的提建议。陶铸同志一边倾听社员们的意见，一边解答问题。当一些社员提到《农业六十条》好是好，只怕变卦时，陶铸同志说：“《农业六十条》中央已经提出至少三十年不变，你们放心，要变只会变好，不会变坏的”。会上有几个社员谈到自留地少了，不利于家庭养猪，要求再增加一点。陶铸同志恳切地说：“可以留百分之七嘛！《农业六十条》有此规定，你们怕什么！”还有的社员提出：“我们队里田多土少，建议在提高粮食单产的同时适当改一部分水田为旱土，种植苎麻等经济作物”。陶铸同志听了高兴地说：“这个建议好，经济作物、家庭副业都要大力发展，稻谷加稻草，社员是很难富起来的”。当一社员提出我们队地势较高，最怕干旱，迫切要求解决一台柴油机时，陶铸同志当面对一县委领导同志说：“请县里给他们解决可不可以？”这位县委领导连忙点头说：“一定照办”。

此外，对社员们关心的公社体制、收益分配和口粮管理等问题，陶铸同志一一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说：《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是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的单位，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劳力和财力。他还强调指出：生产队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的原则，搞好劳动定额，实行财务公开，民主管理。口粮要一次分配到户，让社员自己保管，节约归己。社员家庭副业如养猪、养鸡、养鸭等要积极领导，大力 发展。这时，在座的社员们，个个喜笑颜开，鼓掌叫好。座谈会上，在场的中央和省地领导同志都插了话，也都作了不少指示。整个座谈会开了三个多小时，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是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

座谈会结束后，稍休片刻，便进午餐。我们原准备将午餐设在公社机关，并备有荤菜。陶铸同志执意不从，坚持要在社员家里吃饭，并明确规定不搞荤菜，只搞蔬菜和坛子菜。我们遵照陶铸同志的意见，要赵寿云的妻子做了一桌以蔬菜为主的便餐，陶铸同志非常高兴，边吃边说：“这样的新鲜小菜和坛子菜，在城市里是很难吃到的”。他并一再表扬赵妻烹调技术好，有浓厚的家乡风味。桌上也没有用酒，更无其他饮料，抽的香烟是他自己带来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为政清廉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午餐后，饮过茶，休息了一阵，便启程回县。临别时，陶铸同志对社员们说：“你们队今后是我的联系点，有什么事情请写信告诉我”，并三番五次嘱咐队干部，要加强团结，互相尊重，奋发精神，更上一层楼。队干部和社员们都频频点头说：“请领导放心，我们会一定照您的指示办”。就这样，陶铸等领导同志，便依依不舍的离开了白沙洲。

之后，新民五生产队全体干群，遵照陶铸同志指示，精神更加焕发，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一九六三年在一九六二年丰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全队总产粮食 150000 余斤，亩产 940 斤，比上年增产 17.2%；总产值 18600 元，比上年

增长50%；社员分配纯收入每人160元，比上年增加45.4%。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社员分配口粮和储备粮都有所增加，特别是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都有大的发展。全队扩种了苎麻十多亩，绿肥田由60多亩扩种到130多亩，社员养猪60多头，平均每人一头，养鸡、养鸭560多只，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大大增加。

陶铸同志身为中南局一把手，日理万机，工作足够忙的了，可是他不忘新民五队联系点的工作。是年冬，他派了两位处长，不远千里前来白沙洲，调查点上情况，帮助点上总结经验。后来，这两位处长来信说：“回广州后，将新民五队情况和你们公社情况，一一向陶铸同志汇了报，陶铸同志表示满意，并希望你们继续加强新民五队的领导，迅速制定好一九六四年度生产规划，大力开展多种经营，扩大适量旱土面积，千方百计增加社员收入。同时还希望你们利用冬季，大抓一把农田水利，加高加厚江堤……”。

陶铸同志不幸逝世，但他的高大形像还活在我们心中！他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回忆与邵力子先生的一次通信

曹 建 璋

去年七月，在民革党员评说国民党十三大的时候，前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和平老人邵力子夫人、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傅学文在谈话中有一段说道：“近几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严家淦、黄少谷、谷正纲、袁守谦、高魁元、林挺生、余纪忠、洪寿昌、王惕吾、曹圣芬受聘为评议委员。人到老年，来日无多，更应为后人做点好事。这十几位先生都是邵先生的生前友好，相信他们不会辜负邵先生生前对台湾亲朋故旧的期望，在有生之年，以民族大义为重，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载民革中央主办的《团结报》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第一版）傅学文先生的这段话，表达了对祖国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圆的诚心诚意。我由傅先生这段话自然回忆起了自己一九五六年与邵力子先生通信的往事。

那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前夕，我从报纸上阅读了有关文章，心中感受非常深刻，其中我感受最深刻的一点是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的：“做人的最大事情，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我想，我们现代中国人，都应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纪念孙先生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我们更应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海峡两岸人民的联系和交往，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基于这种认识，我给当时担任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秘书长的邵力子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简介了我叔父曹圣芬先生的情

况，并表示自己作为一名去台人员的爱国亲属，很希望骨肉同胞早日团聚，祖国早日统一。为了使自己在祖国统一的千秋功业中能有所贡献，我还请邵老多加指教。

其时，我由双峰县永丰镇调回家乡益阳，组织上分配我在沙头镇完全小学工作。这所学校的校长叫胡友谊，待同志很是热情，也常和我谈心。有一天，我正上完课，胡校长又来找我了。他手里拿着一个较大的牛皮纸信封，一边递给我，一边又用手捏了一下向我表示：你来了信，信封里面好象还有个纪念章。我接过信件，一看封面，知道是邵老的回信，心中高兴极了。拆封时，又见到信封里附寄了一枚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章。纪念章正面是孙中山先生头像，背面镌有一行纪念文字，铜制，呈四方形，很是精美。

邵先生在回信中首先谈到了与我叔父曹圣芬先生的相识友好关系，接着就全国人民共同盼望的祖国和平统一这件大事谈了如何加强海峡两岸联系的问题。邵先生认为我可以与中华人民广播电台联系，通过稿件广播，以沟通亲属感情。最后，邵先生还写了一句含义深刻、期望甚殷的话：“现在播下一颗种子，将来是会有收获的”。这封信是用十行纸由右至左竖写的，书法极显功力。信末另起一行，写有“附赠纪念章一枚”，字体较小，用了括号。落款署名的三个字，则更为苍劲稳健。我和胡友谊校长看完了信，都非常感动。我深深觉得：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倾注了毕生精力，为后人树立了典范的邵力子先生，对待来信是非常认真的，直到老年，还亲自执笔回信，以表达对青年一代的爱护和勉励；在邵老身上，既有老一辈的爱国传统美德，又有关心人、团结人的伟大襟怀。邵老这封信，手迹弥足珍贵，可惜

后来毁于“文革”，这实在是再也不能补偿的很大的损失。

从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时势发展到今天，海峡两岸关系逐渐趋于缓和，台湾当局在对大陆政策上也出现了某些松动迹象，祖国和平统一的形势，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正是对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邵先生信中所写的“将来是会有收获的”这句话，也在成为现实。情志所托，当以文传意。回忆与邵先生通信一事，历历如在目前，故特叙述如上，或当有补于世。

高宗彝反清起义始末

孙清斋

高宗彝，白莲教徒，沅江白竹山（现团山乡白竹村）高家湾人。宣统二年（191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晨，在三眼塘、赤山两地，率领教徒举行反清起义。高宗彝造反，至今县境广为流传。兹将起义情况，调查整理如下：

逊清末叶，吏治腐败，国势衰微，列强侵凌，瓜分共管之说，甚嚣尘上。加之，频年水旱，灾黎遍野，饥馑尤甚。而国无存恤，赋有加强，鹿死不择荫，铤而走险之局亦已形成。

宣统初年，高宗彝在方里（今三眼塘镇洞口村）、苏家村（今属赤山明月乡）等地宣传白莲教，招徒传艺，诡言能腾云驾雾，避刀剑枪炮，符咒治病。水流湿，火就燥，风行草偃。遂由方里扩展到凤凰、后江湖、株木山、楠竹山等地，拥有教徒三百余人；赤山以苏家村为据点，迅速扩展到砖磁窑、百家沟一带，拥有教徒八十余人，苏家村全村二十余户农民，除文姓两户外，其他无分老幼男女，通通入教，高乃部勒教徒，以王海山、李艳莲、黄宏治、刘敬满、李益青、刘中秋、杨三喜、姜进瑞、杨德益、刘东海、胡志高、孙二秀、熊家妈等二十余人为骨干。封王海山等三人为王爷，李艳莲为军师，刘中秋为大师兄，余皆次第封师兄师弟。铸刀梭标，制松木炮。日夜练武习咒，倡言杀官反清，

拥己为王。高经常往来三眼塘、赤山两地，筹谋策划，决定于宣统二年（1910）五月二十六日两地同时起义，到县城鸡公咀会师，攻打沅江县府，夺取政权。是日晨，高宗彝头戴法冠，坐在高台上，其门徒部下三百余人，手执刀茅，绕台边走边唱，作为起义“誓师”。起义队伍举起“护中灭洋”大旗，从大横村（今属南竹山乡）挥师北伐，经夏家桥（今属三眼塘镇）、马公铺直奔县城。赤山教徒八十余人，亦佩剑跨刀，手持梭标、木棒、松木炮，云集苏家村，掳刘林甫风网船两只，启碇扬帆，乘风破浪，直捣县城鸡公咀。知县傅国俊闻讯，亲率绿营兵水陆两路迎战，两军在鸡公咀遭遇，清兵始鸣虚炮示禁，炮未伤人，高宗彝乃扬言于众曰：“炮不能伤我也！”众信益坚，呐喊猛冲。斯时，傅知县下令水陆合攻，顿时水师舢舨船用炮轰，陆军用洋枪打，起义军之大刀，长茅难以抵挡，一时血肉横飞，死伤枕籍，登时溃退。从赤山前来接应之起义军，船驶至大埠口，闻听三眼塘义军失败，便立即退散，起义遂告失败。

高宗彝反清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派重兵到处缉拿义军党羽，被关杀者甚多。大师兄刘中秋被捕，在审讯中，跪地作法，傅知县急挥佩刀，斩于公堂；黄宏治被杀，颈皮未断，乡亲用麻线缝合葬埋；刘敬满杀后，官府逼其妻提着刘之脑袋游街；杨三喜被杀害后，于其背部挖一小洞，灌以桐油，燃七根灯芯，谓之“熬油点天灯”。此外，教徒姜家瑞、熊家妈、孙二秀等，先后亦被捉拿，均杀之于市。高宗彝族人，畏诛九族，闹夜将族谱修改，谎称高宗彝是高家义子。

清政府为彻底肃清起义军，不断加兵加将，日夜搜索捕捉，连义军家属一个也不放过，到处宰牲畜、烧房屋、抢劫财物。教徒无奈，只得四处转徙，或迁移他乡，或避住远地亲

旧家中，或匿于森林芦洲。因而田园荒芜，杂草丛生，直至清廷逊位，民国成立，其遗族始迁回故居，重振家园。

高宗彝此次起义，三眼塘、赤山两地教徒死于阵地者约四十余人，死于捕杀者约二十余人，死于牢狱者约十余人，至教徒财产损失，则无法可估。起义失败后，高宗彝出走，嗣后，一直杳无音信。

因年深日久，当事者均不复存在，且又无文献资料可查。此篇史料，多根据调查整理，讹漏定多，为使史料求实存真，望知情者赐予教诲补正。

“马日事变”后沅江的 挨户团和清乡委员会

符 涂 湘

民国十六年（1927），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制造反革命“马日事变”后，沅江县国民党政府反动分子和土豪劣绅勾结一起，秉承其主子意旨，将关押在县城山巷口、古城塘两地的所有地主、豪绅全部释放。同时，疯狂地向共产党、工会、农会和国民党左派大肆镇压。为了适应这一反革命需要，旋即将县团防局改编为“挨户团”，由原团防局副局长、反共骨干分子蔡贊勋任团长。八月，国民党沅江县政府进行了改组，并成立“沅江县清乡委员会”，吴雨松任主任。“清乡委员会”成立以后，立即组织“清乡队”分十路下至全县各地，配合“挨户团”四处捉拿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工会、农会骨干和革命群众。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县进入了一个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时期。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工会、农会骨干先后从县城转移到城郊和外地进行地下活动。

“挨户团”、“清乡委员会”是一双“孪生”兄弟，一个拥有兵权，一个拥有政权，他们一登台，就狼狈为奸，无恶不作，对反共剿共十分卖力。“挨户团”刚一成立，第一件事就公开在琼湖镇逮捕豆作业工会会长何炳涛（次年二月杀害于县城官山坪），接着又以“共产暴徒”罪名杀害共产

党员、屠业工会会长藏寿山于火烧坪；还多次逼迫县党部宣传部长、共产党员钟化鹏。“清乡委员会”成立之后，更是凶残之极。八月，茈湖口第十乡农民协会秘书高德全、纠察队长高喜庭、副队长彭冬生被他们杀害于县城鸡公咀。接着，他们又在三码头逮捕了农协委员、共产党员黄海兰，纠察队长、共产党员毛小山以及十五村地下党支部书记陈寅阶和孙梦午、廖志高等，并送往县城监狱，先后杀害于县城鸡公咀，还将他们的首级置三码头示众三天。此外，阳罗洲七乡农协会长高小春，七子浃农协会长王骄龄，兴仁局农协会长谢志才，茈湖口乡梁云等，都先后被他们逮捕下狱，分别杀害于县城鸡公咀和茈湖口等地。民国十七年（1928）元月，熊珊从安乡潜回赤山，与沅江地下党同志蔡杰、徐植南、刘武等，在龙山新湾村刘凤祥家开秘密会议，商量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等问题，被土豪劣绅发现，密报“挨户团”。“挨户团”闻报，即派枪兵捉拿，幸有周围人民群众积极掩护，才得以安全脱险。但“挨户团”这群恶棍死不甘心，四处派人密探，寻找熊珊等人踪迹。二月的一天，“挨户团”探得熊珊在古楼村（现属赤山新湾镇）给贫农熊新文家抬油榨，晚上，即派五十多个枪兵，将古楼村团团围住，四处放哨，层层把守，将熊珊逮捕入狱。不久，便杀害于县城鸡公咀，熊年仅二十三岁。

“挨户团”和“清乡委员会”，为了消灭共产党，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在全县各个角落实行“清党连坐法”，即十户一连，十户中如有同共产党联系和隐情不报者，十户同罪。同时，他们对全县户口造册登记，将共产党员、工会、农会干部及其家属编入另册，长期监视。他们还挖空心思，下尽毒手，对捉拿到手的共产党员先以金钱、地位引诱，再